

QIANSULIANELUOSI
CHUBANGUANLIYANJIU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科研成果汇编

前苏联俄罗斯 出版管理研究

YUMIN 余 敏【主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QIANSULIANELUOSI
CHUBANGUANLIYANJIU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科研成果汇编

前苏联俄罗斯 出版管理研究

YUMIN 余 敏*【主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前苏联俄罗斯出版管理研究/余敏主编.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2.5

ISBN 7-5068-1020-4

I. 前… II. 余… III. ①出版工作-管理-研究-苏联②出版工作-管理-研究-俄罗斯
IV. G23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0501 号

书 名/ 前苏联俄罗斯出版管理研究

书 号/ ISBN 7-5068-1020-4/G·40

责任编辑/ 孙鲁燕

责任印制/ 王大军 刘颖丽

封面设计/ 愚墨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63455164 (总编室) (010) 63454858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地矿印刷厂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6.75 印张 117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的出版业,从宏观管理体制到微观运营模式,都曾经以前苏联为样板。实事求是地讲,这一套经营、管理模式,对新中国建国初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出版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这17年也是新中国出版业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和前苏联的出版业都进入了一个改革与发展的新阶段。中国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仅国民经济保持高速、持续发展,出版业也迎来了又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前苏联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开路,最终走向了苏联的解体并引发了出版业的剧烈动荡。苏联解体10多年以来,俄罗斯出版业依然没有摆脱低迷的状况,依然没有摆脱转型期给出版业带来的痛苦和困惑。2002年4月8日,《文汇报》以《爱书民族遭遇出版危机》为题,报道了2001年以来俄罗斯出版业依然危机重重。

从前苏联到俄罗斯,其出版管理的变化,对社会、对出版业自身的影响是极大的,教训是深刻的,经验是

值得认真总结的。新闻出版总署党组要求我所认真深入研究前苏联及俄罗斯出版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研究由于出版管理政策的变化对出版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产生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为我国的出版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以防止类似出版管理变革引发的不良影响在我国重演。为了更好地落实总署党组的指示,我们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研究小组,赴俄罗斯进行实地考察;在国内召开有关专家学者的座谈会,查阅有关的文献等。通过对近 20 多年来前苏联及俄罗斯出版改革的研究,我们深深感到,在我国出版改革与发展中:

一、必须正确认识新闻出版工作的地位与作用

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新闻出版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必须符合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要把积累先进文化、传播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在前苏联的中早期是非常重视出版工作的社会功能的。但是,在前苏联后期和现在的俄罗斯,对出版物的内容要求逐步淡化,对出版物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没有规定,俄罗斯出版、广播电视和大众媒体部的负责人明确表示不执行意识形态方面的任务。因此在前苏联

后期和俄罗斯,出版成为完全的个人事业,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减弱,展示低级、庸俗内容的出版物盛行,体现高雅的、先进文化的出版物匮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出版物更是寥若晨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

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改革必须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放在首位

前苏联的新闻出版管理制度是一种创造,曾经对政权的稳定和新闻出版业的发展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观念的引入,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管理制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适应。实事求是地讲,前苏联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新闻出版业的某些改革措施是恰当的,也是必须的。比如出版社独立核算、简政放权,比如开放自费出版,比如增加报刊的信息量和可读性等,这些有助于增强新闻出版业的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如果不进行必要的改革,新闻出版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它会失去市场和读者。但是,前苏联的新闻出版制度改革又是不成功的,最关键的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削弱乃至放弃了党和政府对舆论导向的控制。到前苏联末期,失控的舆论不仅干扰了改革的正常进行,甚至加速了苏共的垮台和国家的解体。

我国的新闻出版改革已经进行了20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现在已经由改革试点阶段进入了整体推

进阶段。前苏联新闻出版改革中的某些做法(如出版社独立核算、简政放权,如开放自费出版,如增加报刊的信息量和可读性等),也曾在我国新闻出版改革中运用,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转轨,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入 WTO 以后,我国的新闻出版管理体制仍将进一步改革,但是对下一步的新闻出版改革方向,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首先,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新闻出版的改革,使之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之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使之满足人民的需求,因此一切有利于新闻出版业发展的措施都应当使用。

同时,仍须加强对舆论导向的引导、控制。江泽民同志提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对于我们党的成长、壮大,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对于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具有重要作用。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1996年9月26日在视察《人民日报》时的讲话)因此必须坚持党对舆论导向的控制。舆论导向的关键是出版物的内容而不是形式。在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出版过程及出版形式的管理,强化对出版物内容的管理,应当是我们新闻出版改革的目标。

三、新闻出版管理制度改革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党对新闻出版工作的领导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基本思想。1986年以后,苏共在改革新闻出版管理体制的过程中,逐步放弃了对新闻出版的组织领导权;1990年2月以后,苏共对新闻出版的所有领导权,包括政治、思想的领导权全部丧失殆尽。

党对新闻出版工作的领导方式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政权建立初期,政权尚未稳定、政府机构设置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党的组织利用其相对完善、有效的组织系统,直接参与新闻出版管理工作是必需的,是保证领导的重要方式。但是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定、政府机构设置逐步完备,党对新闻出版工作的管理应当向间接管理,政治、思想管理方向转变。因此前苏联在1986年提出的改革党对文化工作领导的思路的前两条应当说是正确的。但是把党对出版事业的领导不是通过一定的组织而通过党员个人来实现的做法值得研究。

我们国家正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管理模式也出现了诸多的不适应。改善党对新闻出版工作的管理方式,使之更加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是必然的趋势。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汲取前苏联改革给我们留下的深刻教训和启示,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统一起来,通过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加强党的领导的目的,而不能走前苏联从削弱党对新闻出版的领导开始,以取消党对新闻出版的领导告终的路子。

四、新闻出版管理制度的改革必须以繁荣和发展为目标

新闻出版管理制度的建立与改革,目的是促进发展与繁荣,是更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满足市场的需求,但是从前苏联的改革来看,没有做到这一点。从1918年到1985年,前苏联的出版业发展是很快的,图书品种增长了近12倍,图书印数增长了30多倍。但是从1989年起,前苏联图书出版业开始走下坡路。不仅如此,结构失衡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繁荣没有建立在人民的真正需求之上。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严重的“书荒”,图书黑市活跃,许多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百科全书等图书在黑市上高价出售。虽然前苏联政府不断进行打击,但是却无法根本取缔。造成“书荒”和图书黑市活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至少说明没有处理好改革和发展的关系。

我国的新闻出版改革必须汲取前苏联的教训,无论进行怎样的新闻出版改革,关键要看出版业是否越来越发展。如果改革不能促进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那无论改革的理论多么美好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将《前苏联俄罗斯出版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的课题报告,以《前苏联俄罗斯出版管理研究》之名正式出版之际,我们由衷地感谢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同志对本课题和出版研究工作一贯的关心、支持,感谢商务印书馆孟传良先生、人民出版社魏

华女士、人民出版社董拴存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张树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徐耀魁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马龙闪先生、新华社杨京德先生、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高昶先生、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张洪波先生、国家图书馆张芳女士,他们或是提供翻译帮助,或是提供资料援助,或是审阅报告。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就没有现在的成果。我们还要感谢俄罗斯著作权协会主席弗拉吉米尔·特维尔多夫斯基、版权许可部主任根纳基·扎列耶夫、叶莲娜·波良斯卡娅女士;独联体图书发行家协会副主席、执行经理安东·戈尔布诺夫,名誉主席瓦西里·斯拉斯琼年科;维契出版社社长列昂尼德·帕尔科、总编辑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莫斯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亚历山大·卡姆佐罗夫;莫斯科印刷学院院长亚历山大·特西佳年科;俄罗斯和平基金会会长、前苏联出版委员会副主席德米特里·马姆列耶夫等同行们在考察期间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使我们在俄罗斯的日子生活得很愉快。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余 敏

2002年4月10日

目 录

研究报告

前苏联俄罗斯出版管理研究

前言·····	(1)
第一部分：前苏联出版管理体制的变迁·····	(2)
第二部分：俄罗斯出版业的发展与变化·····	(31)
第三部分：几点启示·····	(49)

附录

法律法规

附录一：苏联新闻出版法·····	(59)
附录二：俄罗斯联邦新闻媒体法·····	(77)
附录三：关于俄罗斯联邦对新闻媒体和图书 出版业的国家扶持·····	(111)
附录四：俄罗斯联邦义务上缴文献样本法·····	(120)
附录五：俄罗斯联邦有关新闻出版的 法规摘要·····	(137)

出版统计

- 附录六：前苏联俄罗斯 1984～1999 年图书
报刊出版统计资料…………… (148)

研究资料

- 附录七：苏联出版业新标准资料 (1977～1982)
…………… (189)

前苏联俄罗斯出版管理研究

前 言

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创立了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创建了一套与以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出版管理模式。这一套管理模式在促进前苏联出版业迅速发展、传播和积累民族文化、保证党和政府对舆论导向的控制力等方面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发展，原有的管理体制显得日益僵化，越来越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提出所谓的“新思维”，对实行了50多年的出版管理模式进行了逐步的改革，使出版业发生了一些变化。1990年，前苏联通过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新闻出版法》后，出版政策和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对出版业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垮台提供了舆论支持。

前苏联的出版管理模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

义国家的出版管理体制影响很大。认真总结从前苏联到俄罗斯出版政策演变所带来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的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部分：前苏联出版管理体制的变迁

一、前苏联出版管理体制的建立

早在 1905 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等文章中就提出：出版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应当为劳动人民服务，应当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向党报告工作；出版物应当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观点，反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出版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等原则（《列宁和编辑出版工作》，林穗芳编著，中国书籍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第 5 页）。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至 1985 年改革之前，前苏联出版事业的发展与管理基本是遵循这些原则的。

（一）前苏联出版业的建立

前苏联出版业建立的基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查封、没收的反苏维埃政权的反动报刊、印刷厂；

二是经过逐步改造了的私有出版社；三是依照专业分工的原则逐渐建立的国有出版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前苏联出版业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性质非常单一的行业。

1. 查封、没收反革命报刊、印刷厂

1917年俄历10月28日（公历11月10日），即苏维埃工农政府成立第二天，人民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苏维埃国家第一个出版法令：临时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和革命成功最初几日的严重紧急关头，迫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取缔各种色彩的反革命出版物。……只要新秩序一经巩固，便立即撤消对出版的一切行政管制，并依据适用于广大群众的进步法律，对出版事业规定一种在对法院负责范围内的完全自由。法令规定：号召公开反抗或者不服从工农政府的；用显然是诽谤和歪曲事实的方法来制造混乱的；号召实施显然是犯罪性质的行为的报刊，应予封闭（《苏联东欧问题专题资料》第3期上册第14~15页，李景阳编，东欧中亚研究所1992年印刷），到1917年底有30多家印刷厂收归国有（《列宁和编辑出版工作》，林穗芳编著，中国书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8页）。通过查封反革命报刊，没收其印刷厂归国家所有，不仅为苏维埃出版机构的建立奠定了物质基础，也控制了不利于苏维埃政权的舆论宣传，对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2. 按照专业分工的原则建立国有出版业

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各部委为适应需要陆续建立了专业出版机构，出版相关的专业书刊，这些出版机构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大型专业出版社。此外，党的出版机构如共产党人出版社、政治书籍出版社相继成立。前苏联国有出版业是在专业出版社和党的出版社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党的出版社在前苏联时期尤其占有重要的位置。1990年，前苏联有260多家出版社，其中党的机关系统中有114家，几乎占一半。此外，前苏联还出版406种报纸和286种杂志（《关于苏共的预算和财产》，新华社《参考资料》1990年9月2日）。

3. 对私有出版社逐步改造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允许私有出版社存在，1918年初仅莫斯科就有523家私有出版社。私有出版社和合作出版社出书种数占全国出书总数的56.6%。为了扭转国有出版力量薄弱的局面，前苏联政府开始对私有出版社进行改造。1919年，私有出版社出版种数比例下降到26.7%，到1921年春，大部分私有出版社停业，只有少数在继续出书，出书种数降低到只占5%。

1921年，前苏联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人民委员会为在出版业贯彻新经济政策，于1921年12月12日通过了《关于私人出版社》的决议。规定在国

家出版局监督下允许私有出版社和合作出版社开业，允许私有出版社、合作出版社继续存在，出版、印刷和发行部门允许私人投资，私人可以出版各种期刊和图书，但是不能出版报纸。此后私有出版社又重新活跃起来。到 1924 年，在全国 1127 家出版社中，有私有出版社 442 家。但是由于在允许私有出版社继续存在的同时，对私有出版社的图书实行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制度（根据列宁的指示：不准那些具有明显反动倾向的书籍出版，属于这一类书籍的是宗教的、神秘主义的、反科学的、政治上敌对的书籍），因此私有出版社出版图书种数逐年下降。1922 年私有出版社出书种数曾占全部出书种数的 20%，但 1923 年则降到 11%，1924 年仅占不到 7%（《列宁和编辑出版工作》，林穗芳编著，中国书籍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第 34 页、37 页）。

从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前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开始“大转变”。在经济上，从 1926 年开始，苏共相继进行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资本主义成分；在政治上，通过多次的政治斗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被开除出党，斯大林逐步建立了个人绝对权威，高度集权的体制开始形成，文化体制也“像政治经济体制一样转向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轨道”（《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马龙闪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第 123 页）。私有